

中国“近代史框架”的意识形态化问题¹

刘 平

我目前处在从山东大学转调复旦大学的过程中，有些忙乱，但很高兴在西湖边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此前我为这个会议的主题作了较长时间的资料准备，现在来到西湖，不仅仅是看风景，也不仅仅是讨论问题，感触很深：一半会议在船上开，一半会议在岸上开，形式上与当年中共创建时的上海—南湖会议的确有几分相似。当年，中共之创建，是用西人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打破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我们的会议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遭遇诸多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形势下召开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建构“好的历史学”。

刚才延世大学白永瑞老师谈到了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感受，我也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哈佛燕京学社，是2005年8月到2007年3月。我当时比较深的印象是，除了哈佛的学术活动之外，还参加过许多社会活动。因为我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下层社会与民间结社、民间宗教，所以参加过大波士顿地区很多民间组织的活动，尤其是一贯道、华人基督教会的活动，跟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过交往。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很高端的学术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华人社、国社会的窗口，也为我们“回望中国”提供了可能。

一、 问题由来

这次会议，陈红民老师在6月间发出邀请的时候，我汇报的题目是《近代史框架的意识形态化与去意识形态化》，9月正式参加会议时改为《近代史框架的意识形态化与弱化问题》，2014年2月着手修订时改为现在的题目。之所以要改动题目，正是因为最近的意识形态形势日益紧张，中国政治颇有山雨欲来之势，不仅是批“宪政”、批普世价值，还明确提出要“亮剑”，要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此时谈“去意识形态化”自然是很不合时宜的。

到杭州来之前，我花了好几个晚上，把《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还有人民网、《北京日报》的有关文章都读了一遍，习近平总书记8月19日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读了两遍。现在的“强化意识形态”潮流，都与习近平的讲话有直接关系，而《北京日报》等报刊的评论，其锋芒似乎远在习近平之上。习近平讲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

¹ 这是本人在“什么是好的历史学：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论坛上的发言修订稿（2014年2月第一次修订，6月第二次修订），该论坛由哈佛燕京学社—浙江大学共同发起，杭州西湖，2013年9月。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语气尚属平和。后来几种主流报刊的言论，则凝聚了“阶级斗争”、“中西对抗”的神思。《求是》上有一篇文章这样说道：“我们不会坐视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更不怕别人说我们这个那个。”在9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意识形态斗争要敢于“亮剑”》，颇有杀气。最近这一系列事情对我现在漫谈的题目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社会史的研究，同时也在关注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尤其是目前在中国比较盛行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领域的理论问题，每当涉及这些理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现象，就是目前史学领域出现新的危机、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等问题产生的背景，即学术生态的不断恶化。不难发现，不仅学术腐败与社会环境有关，即使是史学危机与碎片化问题，也与中国的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我最近在修订一篇一年多前的文章时也说到，社会史研究之碎片化，“眼光向下”的同时无法“向上”，只做“小历史”，不知“大历史”，其情形与政治高压、文网密布背景下形成的“乾嘉学派”颇为相似，不同在于，当今更增加了一层铜臭的浸润，至于所谓学术，与乾嘉学派之功力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说，在现在这种高压形势之下，趋利避害是一种人性主导下的自然选择。

我发言题目的主题词之一是“近代史框架”，这个近代史框架包括这样几个层面：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历史宣传，普通民众的历史知识；其内容从纵向来说，包括了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传统上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与教学是自己的本行，宣传与民众知识，也可以不时观察。我的发言主要围绕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展开。另一个主题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联系的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形式，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词。有人说，用学术语言解释意识形态，往往显得抽象、晦涩，简略而言，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主旋律所说的解决“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用什么思想武装头脑的理论学说。

我之所以要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是因应本次会议主题——“什么是好的历史学：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是自己对所从事职业的反思——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从读书到教书，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们的近代史框架，至今依然受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

原本，在改革开放之前，意识形态与近代史框架（或曰整个历史学领域）的畸形结合，本身构成了“极左”思潮的一部分；邓小平抛弃阶级斗争理论与“极左”路线，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之后，中共的政治经济理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这个党本身还保留了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保留了很多那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尽管因为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意识形态对于近代史框架的影响，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却并没有、目前也不可能完全消失。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不愿剥离这种“畸恋”，有时候还会反弹，²自然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维护政权稳定，把人们的思想控制在自

² 2008、09年间，因为众所周知的某某“宪章”的缘故，领导层有一种明显的危机感，许多报刊媒体紧锣密鼓地批判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等所谓“西化思潮”；2011年的两会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提出“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新一届中央领导登台后，在不断强调“深化改革”的同时，不断推出舆论控制措施，尤其是针对

已编织的历史神话范围之内。但由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以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开放性，这种“维护”与“控制”是软弱无力的，这种情况可以从主流媒体的互相矛盾、神经错乱看出端倪。³ 身处社会转型、操“近代史”为业的书生，有必要考虑如何协调执政党强化意识形态之本意与历史研究者突破藩篱之间的张力关系。

我的发言内容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部分：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在近代史领域不断强化直至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在近代史领域出现裂缝、不断弱化的过程；如何协调意识形态与近代史框架的关系。

二、近代史框架的意识形态化

中国共产党人的“近代史观”，与他们的建党理论与建党历史有关，所以，在1980年代以前，“近代史”基本上是中国革命的背景（旧民主主义革命），“现代史”基本上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糅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在1990年代初刚登上大学讲台时，曾经一度教过“中国革命史”，当时曾经读过、翻阅过不少的革命史、近现代史教材，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回过头来看1949年至1980年代之中国近代史框架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有多少近代史、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书，都没有超出毛泽东三篇文章的内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这种“史”，要是没有意识形态，难矣！1949年前后，中共力量由弱到强，其活动内容主要着眼于“斗争”，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也是为斗争服务的。所以，近代史框架之逐渐成熟与意识形态在其中的定型，也有一个过程。

1940年代，共产党人的近代史知识主要来源于毛泽东等人的各类文章，以及陈伯达《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之类政治性读本。真正带有一点“历史意味”的是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1947年由新华书店晋绥分店出版。建国后直至1980年，范文澜的书不断重印，加上戴逸、刘大年的两套《中国近代史稿》，构成了高校近代史（1840—1919）的主要教材。⁴现代史方面，则是胡华在195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上下册，以及李新、彭明、孙思

互联网的控制。

³ 在“亮剑”论出来不久，新华每日电讯刊发于涛的《打击“网络谣言”须防范执行跑偏》，人民网针对政府制造的“休假式治疗”的谣言，发表《“官谣”是消解政府公信力的杀伤性武器》。新华网近日报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一文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善于把握大势，紧跟时代潮流，是我们做好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论述经济工作时也多次提到“大势”这个词。其潜台词是，“世界潮流”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工作。再拿苏联解体一事来说，以前中共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的主要威胁。现在有些人又痛惜苏联的崩溃，前后不一，实在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表现——殊不知，他们在用“谣言”描绘俄罗斯民众的悲惨生活时，又忘记了中俄关系是中国外交目前唯一能够拿得上台面的双边关系，这是极左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思维错乱。

⁴ 建国后，范文澜另外主编《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被人称为“五朵金花”（1980年代之前历史研究领

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59—1962年），后者是高校第一部“现代史”教材，与上述毛泽东三篇文章为基础的“革命史”教材稍稍不同，即增加了一些革命史以外的内容。因为中共夺取政权的关系，这几种教材都有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迎来了郭沫若所说的“科学的春天”，共产党历史学家与高校历史系老师联合，开始把近代史框架之意识形态定型，至少在近代史教科书方面，影响至今。

1981年，胡绳出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其“三次革命高潮”论是近代史研究之“革命史观”的代表。李侃等人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初版于1977年，但在后来不断修订重印，至今，其第四版仍在高校大量使用。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在1980年作为油印本流通，1983年正式出版，这是国内最早使用、冠名为“中国现代史”的教材，后来也是不断修订重印，并加入“共和国史”，在高校广为使用。

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到胡华的《中国革命史》、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再到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直到李侃等人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以及其他的所有近现代史教材，包括相关的中小学教材，都是为了印证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建立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就少不了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色彩。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定型，或曰固化，对于近代史的教学、研究与知识宣传来讲非常重要，至今我们仍然深受影响。陈红民老师，他的思想很开放，但是在他的关于蒋介石研究的书中，依然有着不少意识形态的烙印。比如他使用的语言：蒋介石在1960年代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叫嚣”就是一个贬义词。以前我们读书时，张宪文老师就一直说尽量少用“国民党反动派”，尽量少用那些贬义词。当然，瑕不掩瑜，其中的史料发掘与观点创新是值得称道的。

可悲的是，像陈老师这种能够“走出去”、“引进来”的教授不多。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很多史学工作者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僵化，教书只是一种“稻粱谋”的职业。至于民众的历史知识，由于执政者与主流媒体的刻意渲染，带有极大的偏见，当今愈演愈烈的“反日”、“反美”潮流即是一例。

上面说的是意识形态化的强化问题，为什么要讲它后来的弱化呢？

三、意识形态在近代史框架的弱化问题

前几年在广州花都区（原花县）开太平天国史的会，适逢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华教授去世，一向直言的崔之清教授说了这么一句话：“谁叫他跟毛主席作对呢？这不，毛主席在自己生日这天

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等热点也被称为“五朵金花”。《中国通史》与《中国史稿》均为多卷本，陆续出版，在高校中使用不广。

找他谈话去了。”高华教授在毛泽东诞辰那一天去世，崔老师的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无奈——他在南京大学当历史系主任期间，高华出了那本墙内开花墙外香（or 墙外开花墙内香？）的书，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解决了高华的职称问题，但也有许多力所不及之处。我们在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跟高华老师就很熟悉，那时的政治空气只是在八九事件之后的短时紧张，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宽松的，后来到高华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由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问题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当然比不上毛泽东时代，那时可是因意识形态而能直接取人性命的时代）。高华的书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海外普遍都是正面评价，国内基本上把它当作禁书，虽然名义上没有列为禁书，但绝对不能进入大陆。所以有一个律师不小心从香港买了一本，进关时被没收，还引发了一场官司。

高华的这本书是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框架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在当今中国，由于一些客观条件、尤其是互联网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政治挂帅”、“一言堂”局面已经不可能回归。这30年来，不管怎么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经济上的进步不用说，实际上，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政治上的进步，这个进步就是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个开放是从最高端向最低端不断发展的过程（高层领导具备什么样的思维对于“开放”程度大有影响）。高华是大陆学者，他的这本书主要是依据大陆公开资料完成的，出版之后，成为了一个标志——在这本书面世之前，意识形态对于近代史框架的影响牢不可破，此后，近代史框架之意识形态弱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举例来讲，最近这些年，陈红民老师，蒋永敬教授，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奎松教授、沈志华教授，中国社科院的杨天石研究员，他们的研究路径实际上是和高华很相像的，就是充分挖掘史料，包括使用中国大陆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挥过作用的党史资料、革命史资料、地方史资料，包括苏联垮台以后对外开放的“红档”，斯坦福大学解密的《蒋介石日记》，等等，写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那些以前因为受意识形态影响而人为掩盖、歪曲的很多历史真相开始暴露在世人面前。在这一弱化过程中，还有两种动力值得注意，一是国内当事人的回忆录，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二是国内外作者在海外出版的诸多有影响的著作与回忆录，因为“敏感”，或是属于“禁书”，就不一一列举其名目了。

不难看出，上述各位学者所做的实证研究，以及这种实证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远远超过了高华教授。高华教授的书是在香港出版的，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因此他的书是一个标志——合理而不合“法”；后来的杨奎松、沈志华、杨天石、黄道炫等人的研究是意识形态弱化过程中的另外一种标志——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⁵当然，还有第三种标志，就是互联网、信息化

⁵ 特别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杨天石：《辛亥前后史事发微》、《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以及黄道炫所著《中央苏区的革命》。

技术的不断进步，从物质上消解了意识形态原本拥有的强大力量（当然，由于执政者担忧“亡党亡国”，一直致力于建筑网络“防火墙”）。

这些年来，在针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执政者强化意识形态的意愿不断加强，而实际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在 1990 年代初，江泽民提倡要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所以高校政治课当中增加了一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原先的《中国革命史》课程逐渐退出），再后来，又增加了“毛邓三”等政治课，还有就是花费大量金钱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包括《中国近代史》在内的诸多人文社科领域科目均纳入其中，这是强化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

但是，近代史领域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却使这种强调、强化变成泥足巨人，使意识形态走向了弱化。所谓“弱化”，就是说，很多学者通过挖掘档案，用具体史实推翻了以前近代史框架中意识形态铁板一块的局面，诸多著名历史事件，比如鸦片战争时期的“投降派”、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对于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共建党问题、中央苏区历史、长征史、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中美合作所、中苏关系、土改，直至朝鲜战争、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还有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琦善、洪秀全、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陈炯明、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黎元洪、张学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以及电影文学中的周扒皮、刘文彩、南霸天，等等。很多历史事件、人物，都通过历史档案的开放（国内更多的是有限开放）、当事人回忆录以及研究者的不断发掘，还原或是部分还原了以往我们在教科书上所看不到的面相。这种历史面相很有震撼力，给一般民众很大的启蒙，这种震撼与启蒙对执政党是一种挑战，因而制定了种种措施加以限制、制止，其中包括“不能随便批评党的历史，不能歪曲党的历史”，实际上是对这种挑战的一个回应。

四、“历史虚无主义”还是“历史真实”？

当今近代史框架之意识形态化的弱化有两种后果：一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怎样处理意识形态弱化的问题”，处理意识形态弱化问题是否真的要“亮剑”？⁶二是对研究者来讲，这个弱化有没有底线？在饭桌上、私下里讲的话和今天这种会议场合讲的话是否一样？与公开发表的是否一样？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意识形态”的强化与弱化，甚至是“去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不少高层领导、社会名流不也提到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吗？⁷如果高校能够去行政化，高校之意识形态化还能存在多久呢？如果少数人、或少数媒体的个别人一意孤行，梦想复辟文革，这条路走得通吗？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不是和当今主流舆论唱对台戏，而是为执政者

⁶ 从 2013 年 9 月西湖会议至 2014 年 2 月的当下，中国政治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亮剑”论似乎已经消失，近日刚发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也有与“普世价值”之民主、自由、法治等内容一模一样的东西。同时近期围绕某个前高层的腐败大案波澜迭起，在这一幕幕反腐大戏中，人们从那些口含“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与“维稳”天宪的大佬身上，看到的尽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丑陋嘴脸。

⁷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甚至提出：“一切党派退出学校”、“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

“分忧”。

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意图强化意识形态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但今日之时势，已经不是毛泽东一手遮天的时代，中共官员的道德与社会公信力在“特色”时代遭遇全面质疑，以致任何主流的发声，往往遭遇“呛声”，例如关于三峡大坝的两个关键人物，官方评价与民间舆论完全异样：官方是压抑黄万里，褒扬张光斗，民间舆论恰恰相反，近日的东莞“扫黄”亦然。反应在近代史框架，或整个历史领域，官方高调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禁止批评党史上的错误，但又拿不出一两样像样的武器，至少你应该实事求是，襟怀坦白，或是组织人力物力，针对“歪曲”、“攻击”、“虚无”之类，或是层层防守，或是主动出击，让老百姓辨别黑白，认清正邪。令人不解的是，人们除了看到有关部门的固守教条（不禁让人想起了清末的顽固派）、给人乱扣帽子、以行政手段压制不同声音以外，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弹，能坚持多久呢？

滥用意识形态手段，往往容易步入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怪圈，那时候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是权力斗争，历史可以随意涂抹，李立三、刘少奇去安源可以变成只有一个“毛委员去安源”；“朱德的扁担”可以变成“林彪的扁担”；“利用小说反党”成为“一大发明”；《红岩》作者罗广斌最终明白，他不但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只好选择自杀了却一生；所谓“江姐”，其子用脚投票，往生美国。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近日去世，当年周恩来去世，他曾伪造“总理遗言”，当时的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电话通知，宣布这是一份“反革命谣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追查，李君旭被捕后被判死刑，旋因四人帮倒台而幸免于难，随后因为撰写反对“四人帮”的战斗檄文而获得平反。如果放在今天，这位李某还要制造什么“谣言”的话，也难逃被抓的命运。再看看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社会，其意识形态统治可谓登峰造极，但红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所以，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用与不用、怎么用是个大问题，执政者当三思。

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有特定的内涵，“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对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了。毛泽东晚年转而与美日建交，邓小平复出，首先访问的是美国，但我们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趋于保守，主流媒体一直时断时续的妖魔化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明眼人都知道，中国社会近100多年来的点滴进步——现代化历程——无一不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当代国人身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有哪一样不是洋人洋货输入的结果呢？即使是马列思想，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当然，这一引进之物的优劣，时代潮流已经冲刷得明明白白，不必说苏联东欧剧变之类，单是中共1978年以后的执政路线，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东西吗？我们不能用一个“与时俱进”的词语，就把自己以往的历史都抹杀掉吧？邓小平的政策是“猫论”、“摸论”，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不讨论姓社姓资”。光这个“不讨论姓社姓资”的提法，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那可是一个会被折腾致死的反革命罪名！他还说过：“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的话，如果放在今天，“领导”同样是要找他的麻烦的。执政者也明白，清末之时，顽固派误人误家误朝廷；改革开放之前搞闭关锁国，与文明社会的距离愈行愈远。即便如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至今还在杳杳冥冥之中，甚至有人借批“宪

政”之名加以扼杀。

人们也能理解的是，1989 年以来，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是官僚阶层与原始资本主义结合，形成了一个负能量极大的权贵利益集团（也有人称之为“新阶级”或“权贵资产阶级”），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受益人，而广大百姓却深受医疗教育住房等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酝酿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为“维稳”对象。这个时候讲意识形态，是哪个阶级、什么立场的意识形态呢？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权贵资本主义开道，保护权贵利益集团畅行无阻吗？我想，执政者是不会这么想的。那么，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就需要构建新的内容并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些年，中共主要领导人一再表态“要转变执政思维”、“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意识形态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回到近代史框架，主流媒体对前述“弱化”扣上了“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党的历史”等帽子，这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无视前述“弱化”带来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一部“近代史”（1840—1919）就只剩下一件至今带来政治、外交之负面影响的“爱国主义”外衣；如果不能讲“党的历史错误”，那么，一部现代史（1919—1949）、一部当代史（1949 年以来的历史），除了已经被“解构”、“弱化”的东西，还有什么可讲呢？这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还有，这也不准讲，那也不准讲，到处是禁区，那你首先应该有能力自圆其说。当年毛泽东、康生以“利用小说反党”的莫须有罪名打到习仲勋，如果不加以批评反思，则毛泽东打击习仲勋是份内之事；反之，要说明、证明习仲勋是受害者，就必须讲毛的错误或“党的历史错误”。逻辑通顺，才能以理服人。

考虑到执政者的两难、多难处境，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建议：前述近代史框架的四个方面，历史研究应该以法律作保障，撤销“禁区”，全面松绑，鼓励创新，开一代风气；历史教育，除了在大中小学使用类似《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之类的教材、以符合“国情”之外，其他专门史、断代史、人物研究等内容，要参照最新史学成果加以改进、改革；历史宣传仍然由执政者与其掌控的媒体主导；民众历史知识的获取则任由民众选择。如此，在当今仍然处于“特色”阶段的中国，或可两全其美。

最后，围绕本次会议主题，简单谈点感想。最近几十年，中国为什么没有“好的历史学”？实际上大家都明白，意识形态之“负能量”对历史学影响太大，从业者受到的束缚太多。意识形态对于台湾香港学者、韩国日本学者、欧美学者来讲不一定是问题，但是对中国大陆的学者来讲，真的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目前国际国内的局势复杂多变，置身于中国现实环境当中，我们只能从一个知识分子良心出发，做一些有限度的思考与呼吁——中共信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灵魂不是“实事求是”吗？政治不要干预学术，否则与“中世纪”何异？被禁锢了思想的民族有光明、希望可言吗？

附言：本文于 2014 年 6 月修订完成后，在中国无法发表——尽管本文只是梳理中国“近代史框架”的意识形态化问题，立论、言语平和，但当前中国的一个吊诡是，民族、宗教、意识形

态等敏感领域,发声的只能是官方语言与官方媒体。进入 2015 年,中国的政治氛围愈加诡异,党和政府管控高校教师言论的态势开始形成“高压”。1 月 29 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谈到“三个决不”: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从中不难看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象。我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存在违反“三个决不”的内容。

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

本会は、16世紀以降の西洋文明の東漸とそれに伴う文化・言語の接触に関する研究を趣旨とし、具体的には次のような課題が含まれる。

- I. 西洋文明の伝来とそれに伴う言語接触の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
- II. 西洋の概念の東洋化と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新語彙の交流と普及に関する研究
- III. 近代学術用語の成立・普及、およびその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 IV. 欧米人の中国語学研究（語法、語彙、音韻、文体、官話、方言研究等々）に関する考察
- V. 宣教師による文化教育事業の諸問題（例えば教育事業、出版事業、医療事業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 VI. 漢訳聖書等の翻訳に関する研究
- VII. その他の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例えば、布教と近代文明の啓蒙、近代印刷術の導入とその影響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本会は、当面以下のような活動を行う。

1. 年3回程度の研究会
2. 年2回の会誌『或問』の発行
3. 語彙索引や影印等の資料集（『或問叢書』）の発行
4.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の各種コーパス（資料庫）及び語彙検索サービスの提供
5. (4)のための各種資料のデータベースの制作
6. 内外研究者との積極的な学術交流

会員

本会の研究会に出席し、会誌『或問』を購読する人を会員と認める。

本会は、言語学、歴史学、科学史等諸分野の研究者の力を結集させ、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目指している。また研究会、会誌の発行によって若手の研究者に活躍の場を提供する。学問分野の垣根を越えての多くの参集を期待している。本会は当面、事務局を下記に置き、諸事項に関する問い合わせも下記にて行う。

〒564-8680 吹田市山手町 3-3-35 関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科
内田慶市研究室 (Tel.ダイヤルイン 06-6368-0431)

E-mail: keiuchid@pp.iij4u.or.jp

URL: <http://www2.itc.kansai-u.ac.jp/~shkky/>

代表世話人：内田慶市